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的综合 体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 李涌平 ·

一、引言：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代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①一方面,人不同于动物。人类能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并为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动物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的本质有其不对应性。所以说人口规律不单纯是一种自然规律更是一种社会规律。人有能动性,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另一方面,人类300万年缓慢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人类通过劳动来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但人口总是受到动物数量多少、灾害有无、土地大小等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由于自然“有限”的表现和“无限”的深度,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适应着自然。人口适应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缓慢发展到农耕畜养,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并适应自然的一个明显体现。上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工具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进行了人口转变。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人们又要在自身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之下,重新研究人与自然的改造同时适应的关系。

回顾过去一些理论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今天的现实。马尔萨斯(Malthus)^②是人口理论悲观学派代表。他提出,人口必定受生活资料的制约。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时进行预防的话,那么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如果把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的观点按其性质扩展到人口与自然关系上的话,应该说马尔萨斯主张的是人受制于自然,是主自然论者。持更加悲观的人口学观点的较为突出的还有罗马俱乐部学派(Rome-Club),^③该学派从自然科学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忽略社会性,进行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综合定量研究,认为人有增长的极限。

鲍瑟博(Boserup)^④是人口理论乐观学派的代表,通过对人口数量和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考证,她得出了人口发展是生活资料丰富和生产方式提高的源泉,缓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人类发挥自己的社会能动性。把这种观点应用到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应该是人口增长有助于改造自然,她是主人论者。持更加乐观人口学观点的还有西蒙(Simon),^⑤他主张人口能动论。不过

① 马克思:1847,《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② 马尔萨斯(Malthus):T. R.,1971,《人口原理》。

③ 罗马俱乐部(Romeclub)报告书,1972,《增长的极限》。

④ 鲍瑟博(Boserup),E.:1965,《人口增长的条件》。

⑤ 西蒙(Simon),J. L.:1997,《人口增长经济学》。

由于西蒙过分强调了人口对经济的正面作用,理论多少失于偏激。

今天我们人类不仅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持续性)也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可行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就是符合现今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反映。社会可持续发展是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根据人类发展的严峻现实提出的未来国际发展战略。它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于1994年在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上进一步得到了论证。社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①:一是人类不要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要以区域的利益牺牲全球的利益;二是人类不要以今天的利益牺牲明天的利益,即以子孙后代的不满足换取现在的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发展的、改造同时适应的辩证关系。

二、人口、生产、环境三要素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人类在科学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要科学地适应自然协调于自然。为了更好地理解改造与协调(即“索取”与“给予”)人与自然的抽象关系,这一关系可具体地分解为人口、生产、环境三者的相互联系。应明确的是,这里所定义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②它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可细分为地球生态环境、地理气候灾害环境、以及土地与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可细分为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教育环境。这种三要素分解不仅考虑了人口、生产、环境各自在具体政策实施中的可行性和独立性,也考虑了各因素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均衡,是较为科学的。如果换一种分解,比如社会、经济、环境,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这里社会的内涵可以包括生产与环境。而且谈到社会政策我们多少会感到抽象,所以它不如人口、生产、环境的分解使人感到确切和清晰。另外应该十分清楚的是,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绿化祖国是我国的两个基本国策,而且发展生产又是我国目前工作任务的中心,所以人口、生产、环境的划分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生产、环境的划分是一种必然。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的宗旨,就是维护社会进步,即维护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协调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这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联系着的对立面的斗争,是进步的基础。这种斗争现今体现在过快的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环境调节之中。所以说从社会进步角度来看,社会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扬弃一些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观点。这种继承和扬弃综合地反映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的交叉对立统一的关系上。我们在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同时,也要考虑人口规模、人口构成,即人口变化,同时不要忘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调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合乎理性的社会进步,才能有科学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三者之间的综合关系,发展地动态地体现着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生产、环境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人口、生产、环境三者之间,我们不应单纯地强调任何一者或两者,比如人口与生产(以及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而是要强调三者综合的多方位的对立统一。按系统论观点,人口与生产(以及人与环境)形成了一开放的子系统,这一子系统接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干涉和影响,隶属于人口、生产、环境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系统。过去,我们曾过分强调一者,人口增长,认为人多力量大,造成了今天人口基数庞大的沉重人口负担。今天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两者,比如

^① 叶文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曹占泉:《人口环境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说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协调,而忽视环境调节,明天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犯了比昨天更为严重的错误。总之,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而应该综合地、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行动实施上是有侧重点的。人口、生产、环境复杂交叉关系不仅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符合人类社会持久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情况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行动方向应体现在三个不同的侧面上:(1)人口增长要和谐于环境的调节;(2)经济发展要和谐于环境的调节;(3)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要和谐于环境的调节。显然,由于过去重视的不够,现今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是环境的调节。由于环境的调节包括自然环境的调节和社会环境的调节,所以说这三个侧面还可细分为六个不同的小侧面。对这些侧重点的研究和探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向。总之,我们不但要对立统一地看问题,还要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

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环境调节,是指一种整体社会文明的提高。这种整体社会文明涉及面较大,涵义较深,它包括环境文明、人口文明、生产文明。所谓的环境文明的提高,就是要人们树立新的资源环境观念,树立有关资源环境的价值观念,为自然环境的调节服务。我们应把自然环境的调节做一种最终目的,而把社会环境的调节做为服务这一最终目的手段。一方面说,没有较好的社会环境的调节就不可能有较令人满意的自然环境的调节,这就象人们没有形成不随地吐痰的社会风气的时候,人对自然环境的痰污染是会比较明显的。不过,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说,较好的自然环境的调节又会对社会环境的调节起促进作用。显然当街道打扫的很干净时一些人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多少会受到节制,好的环境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习惯。人们必须建立、适应新的人口、生产、环境综合关系的新价值观、新世界观。这种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人们更新人对自然原有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特别具体地就是重新评判接受自然资源观以及建立社会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和良好个人习惯。我们要树立新的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文明。

人口文明的提高,主要是指人们的生育文明、迁移文明、家庭婚姻文明和死亡文明(诸如禁烟等直接影响人口预期寿命并且和个人习惯和行为相关的东西)的综合改善,这种改善要以人口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人口构成、人口移动等的合理规化为服务目的。

生产文明的提高,主要是指,一方面人们在生产投入、生产产出和生产排放中的旧观念的更新;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环节的旧认识和旧习俗的改进。这种更新和改进要为合理的经济发展服务,为考虑现在和将来的最佳资源配置服务。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追求的“合理的经济发展”,不是经济效益最大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是考虑人口、生产、环境综合而得出的社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简言之,这里的生产文明是现阶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和微观生产导向。

显然,在很多情况中,经济效益最大的经济发展往往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一致。举例说明,就消费模式而言,我们应建立起适合于国情的汽车消费模式。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对整体经济发展起推进作用。我国人口众多,汽油资源有限、可耕地面积较少并且还和人口聚集地相重和。如果把汽车消费做为未来我国的一个非控制性的消费模式,并在此设想之下大力地、无节制地发展汽车工业,那么这种经济观念和所产生的经济行为是有很大探讨余地的。非限制性的汽车消费模式带来的生产文明虽然

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为我国带来令人忧虑的未来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公路侵蚀和占用耕地等。我们应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汽车消费模式,并把这种消费模式做为一种生产文明加以宣传和诱导。为此,在建立汽车消费模式是否在我国合理并且可行的战略之时,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把人口、生产、环境的三方面国情综合起来,进行全方位决策。唯生产而生产,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不顾人口和环境的两大国情,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

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和衡量标准

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地反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就是人口自身生产一方面要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①另一方面各要素又要和环境调节相互和谐、相互适应。这里的和谐和适应,不仅应具有空间的合理性,也应有时间的合理性,空间合理性和时间合理性应是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这两个衡量标准体现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三者综合发展关系的社会整体效益。

所谓的空间合理性就是某一区域的人口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环境改进要和社会整体对这三者某一时间的需求,有着科学合理的平衡。举例说,比如我们在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考虑工业对劳动力的“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不考虑工业生产方式左右着的投入、产出、排放,以及工业对周边农业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压力,那么这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探讨,虽然有价值,非常必要,但并不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合理性要求,是不科学的。同样,我们在研究农村人口移动(包括农村人口外部移动,人口流动,和人口内部转移)时,必须研究这种人口移动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调节的各自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最后进行科学的有机的综合。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人口移动对经济发展总合“推”和“拉”因素之后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要看到它对环境调节的总合后的可能会有的消极作用(诸如产生超生游击队的有关人口影响、对城市卫生及治安的社会环境影响、乡镇企业能源利用及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对自然环境影响等)。总之,空间合理性应体现人口、生产、环境三要素在静态时本身固有的规律相互作用的综合。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关国际区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的例子。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不到 1/4,而却占用消耗着地球 3/4 以上的正在开发和利用的能源。^②所以说,人类生存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合理性上讲,发达国家应该用实际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不应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以及自己的价值尺度为各种借口,干涉别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方针。另外发达国家也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同时降低自己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改变其具有掠夺占有欲的国际剥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整体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合理性,人类才有可生存这一基本人权,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也就是说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发达国家进行自我的环境调节,这种调节包括进行大气臭氧层修补和污染控制的研究和行动等自然环境调节。除此之外,更为主要的就是,一些发达国家要变更其过去错误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权术,进行社会环境的调节。前者自然环境的调节取决于发达国家较发达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较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后者社会环境的调节取决于发达国家过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忽视以及不正确的认识。

^① 张纯元主编:《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世界资源保护所:《世界资源 1990—1991》,能源出版社,1992年版。

空间合理性体现在某一国家(或省、市、自治区),也就是区域利益要符合整体利益。比如,有些地区粮食丰收、经济发展较快,人们会认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应该适当减缓,这种思想就没有考虑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局部地区的超额的经济收益可以考虑上交国家,也可以考虑再生产的投入和环境的改进,服务于整体的生产和整体的人口规划和环境规划。在我国,这种空间合理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人们改变自己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区域观念,改变地方对自己地方的资源以及生产实体的不合理的保护主义意识。只有进行这种社会环境调节,即造就整体社会文明的提高,我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才会更有序、更合理地发展,我国的人口控制才能作为一种国策去顺利贯彻执行。另外,社会环境的调节,也会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促使自然环境的调节。特别是在我国,环境保护也是一个国策,人们物质生活改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明显有利于改进人们的社会环保意识,有利于我国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所谓时间的合理性,就是考虑各因素发展变化之中的动态适应。这种动态的时间序列适应和静态的时间点适应不同。比如,生产和环境可以在某一时间容许 12 亿人口的存在,但从发展角度看,这种容许存在的代价也许是对自然环境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对生产发展一定程度的畸形扭曲。也就是说,这是以未来子孙后代的不适应为存在前提的,显然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人口惯性,12 亿人口还会在未来继续增长,如果进一步考虑这种人口冲力,以及这种人口现状和发展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口压力,我们也许应该承认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人口或许要低于所讨论的 12 亿人口。总之,时间合理性应体现人口、生产、环境三要素发展运动中特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综合。

空间合理性讲的是静态的人口、生产、环境的综合;时间合理性讲的是动态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的综合。关于“静”和“动”的统一关系,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夫之有精辟之论,“静以局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静者亦动而灵。”^①“动而不离乎静之存,静而皆备其动之理。”^②这说明了空间合理性和时间合理性有着互透、互藏、不可偏持的关系。例如,某一区域之中,假定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如上所论是 10 亿,在该区域具有空间和时间合理性,但该区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从全球看也许是 8 亿。也就是说,从时间合理性和空间合理性上讲,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具有统计分配意义,即它是服从一定分配规律的数字集合,它是有一定变化范围的目标体系。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是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它反映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时的最佳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变化范围的定量研究是人口学未来在可持续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简言之,“静”和“动”的统一,造就了复杂,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合理性。

可持续发展的总的出发点是不同子系统构成的社会整体系统,这一整体系统具有子目标和衡量标准。这一整体系统的发展是复杂的、难确定的,所以说从整体系统和子系统的不同立足点,人们会达成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度量。不过,按辩证唯物主义对绝对真理追求的真理观,我们应该驳斥一切不可知论,应该相信人类自己的认识能力,人们是绝对地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不断地更深入、不断地更全面地认识绝对的社会发展的一切本质和规律的。不过,考虑人们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我们这种度量说成是度量范围也许更科学。无论这种“时间”和“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衡量标准会有怎样的可变范围,它比独立的经

① 王夫之:《太易篇》,《张子正蒙注》,卷 7。

② 王夫之:《诚明篇》,《张子正蒙注》,卷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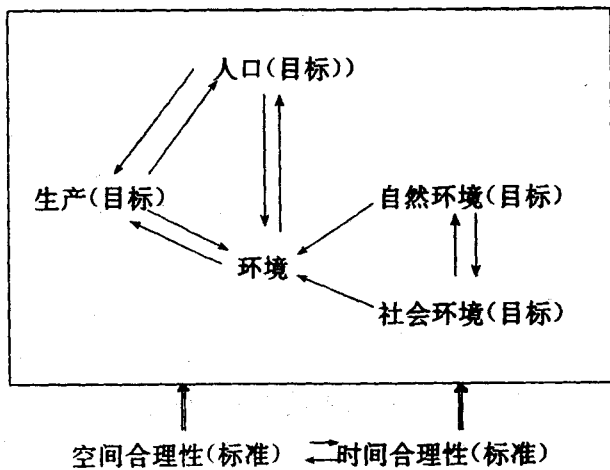


图 社会可持续发展体系、目标、衡量标准

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

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以空间合理性和时间合理性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人口秩序要求和新的国际人口规划要求。这种新人口秩序和人口规划，从行动上要求各国家和地区设立新的人口目标并建立人口、生产、环境三者相和谐的区域战略。就人口而论，人口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动态过程。制约人口发展的众多因素相互交织在经济过程、社会过程和自然过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可伸缩网络上。这种动态说明，对人口发展有目的的实行长期综合规划的理论基础应具有可变化和可发展的理论特征。不把人口现象及其规律纳入复杂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环境调节的综合发展关系之中去，我们就不能客观地对有社会和自然双重属性的人口过程予以解释和揭示，就会偏离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其理论思想结果就是自主不自主地步入主自然论的悲观人口学体系，或主人口论的乐观人口学体系。其实践行为结果分别表现为，一方面就是，由于对人口压力的过高估计进行违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快、过大、过急的人口控制；或者另一方面，由于对人口压力的过低估计进行另一意义的违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慢、过小、过缓的人口控制。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从人口、生产、环境三个方面，发展地、综合地去评判我们的人口发展，进而达成怎样科学地客观地控制人口，达成社会进步。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在科学技术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大前提下，一方面去依靠科学技术进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去依靠科学技术进行自然环境的改进。否则，忽视这一大前提，尤其是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两个具体行动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很有可能走向畸形。所以说，端正科学技术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正确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从政策上讲，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根据人口、生产、环境的理论综合，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把国家乃至国际多方位政策的考虑作为制定新发展规划、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从整体上讲，人口、生产、环境三者关系反映在政策实施中，(下转第 19 页)

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个体衡量标准，有本质上的发展。我们的衡量标准反映了人口、生产、环境三者的综合关系。它是对立统一地，而不是静止割裂地看问题，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前面我们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可持续发展人口)，我们还可以类似地去分别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目标和环境目标。基于这些目标本身的较相似的含义，目标之间的关系，目标系统与衡量标准的联系，以及衡量标准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上面讨论的结果简单地总结和类推在图中。

计,乡镇工业造成的环境损失相当于同期利税的79.79%。当然,在其发展初期,这种破坏作用会因环境的自净能力和再生能力较强而不易显露,但发展到目前水平之后,矛盾就开始趋于尖锐了。1994年淮河的严重污染严重影响了流域中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污染源主要来自中上游遍地开花的“五小”工业,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低水平的环境滥用型小企业已成为对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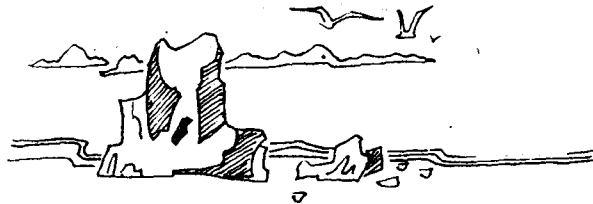
发展获得的经济成果,尤其是由环境损失转化而来的所谓收益被怎样运用,对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影响重大。正确的使用思路,应注重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包括替代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条件的改善、发展教育与科研事业等,而不能将发展成果过度地用于眼前消费。特别是如果将通过环境滥用获得的收益用于眼前消费,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更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通常说高消费不符合国情,还仅仅是从人口角度理解这一问题的。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这样一些现象中:“五小”企业通过滥用环境获得的收入被用于当前消费而不是提高企业水平,土地批租的收入被用于公费消费而非农业投入,出口优质煤的钱被用来进口轿车而非提高能效和净煤工艺,这实质上成为与人口压力关系不很强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即使我国的人口只有2亿,这种恶性循环过程也足以毁掉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程。

对以上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障碍,本文不打算讨论对策。对策是不言自明的。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笼统地谈论持续发展只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宣传效应,要使我国在未来走上持续发展道路,关键还是要深化改革,努力革除那些导致低效益、高浪费恶果的弊病,使我国的发展更为扎实健康,为持续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接第25页)我们也许应该尝试把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国策)和自然环境调节(环境保护国策)作为局部阶段性的政策,把社会环境调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社会文明)作为一般性的政策,把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视为有龙头意义的关键性政策。我们还要把这四种政策的和谐适应的综合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国产业部门的发展,住房建设和其他经济规划、人口规划、教育规划、环境规划等都要紧密地围绕于上述四个政策的定性划分和一个核心,去展开各部门自己的工作。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具体落实。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口所)



^① 参见王健民的研究报告“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环境科学》14(4),1993。